

现出抗日战争对于在战略上遏制日本扩大侵略战争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此外,对于日本占领当局在华中和华南地区的所谓“开发”,也应该开展系统研究。因为沦陷区研究亦是抗日战争史研究非常重要之一部分。

[作者陈谦平,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郭阳)

区域抗战史研究需有更宏观的视野

袁成毅

抗日战争前后持续14年,涉及中国国土的大部分地区,根据战后国民政府的统计,全国人口80%的地区均遭日军破坏蹂躏。^①由于战争时间长,涉及地域广,无论是从日军侵略的角度还是从中国各地抵抗的角度而言,不同的区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对抗战史的研究除了整体的宏观研究和专题研究外,专门针对某一区域的抗战史研究也同样十分重要。近些年来,伴随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热潮,有关区域抗战史研究也受到各方面重视,产出了不少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抗战史的内容。

由于区域抗战史将研究范围限定于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或行政区域,这就必然产生一个区域与整体的关系问题。在当下区域抗战史的不少论著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研究并没有将一方区域抗战的史事置于整个战争的全局中来把握,往往就事论事,鲜见区域与整体的关联,致使区域抗战史的研究处于一种“碎片化”的状态,或者说仅停留在地方志的记述层面,因此,区域抗战史的研究必须有更为宏观的视野。

一、宏观视野不是简单套用“三阶段论”

毛泽东在1938年所著《论持久战》中将中国的抗战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这一预判也基本上被后来战争演进的过程所证实,尽管学界对于中国战场是否存在一个单独的战略反攻阶段尚存争议,但总的来讲,就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体或者全局而言,“三阶段论”的叙事模式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个阶段只是对中国全民抗战从整体战略的角度所作的划分,它绝不意味着各地的抗战史都经历了三个阶段。事实上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作为区域抗战史的研究若简单套用三阶段来叙述,很难展现该区域抗战的真实面貌和特点。以重庆为中心的大西南地区为例,实际上是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才开始大规模遭到日军轰炸,成为战争的重灾区。在这一地区,从1938年到1941年间日军一直处于航空作战的进攻态势,中国方面完全处于守势,至于中方发起的反攻作战,这一地区则又早于国内其他地区,因为自美国空军开始援华助战后,从1943年实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4),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44页。

际上在空战中就开始了战略性反攻。

而在华北和东部地区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到1937年底很多省份相继沦陷,大规模的地面作战就已经停止,中日双方实际上便进入了相持的阶段。以浙江省为例,1937年12月底,日军在占领杭州和浙西其他部分地区后,与国民政府守军以钱塘江这一天然屏障为界形成了长达三年的隔江对峙局面,直到1940年以后日军才渡江南侵。1941—1942年,日军又分别在浙东沿海和腹地发起宁(波)绍(兴)战役和浙赣战役。日军作战态势的这种变化不但直接影响到了浙江境内沦陷区、国统区力量的彼此消长,而且也使得在浙江的国共关系有别于其他地区。因为一般的情形是在战略防御阶段国共关系整体上比较好,到相持阶段国民党“积极反共”的倾向不断得到强化,然而就浙江的国共关系而言,大体可以1941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国共关系在浙江总得来说还是比较好,因为中共原来在浙江活动的红军游击武装经与国民党方面的多次谈判,于1938年3月离开浙江北上到了皖南,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中共武装力量离开浙江后,中共在浙江主要是立足于重建组织机构,扩大党员队伍,这在很长一个时期并没有受到国民党方面的过多限制,反而是国民党“借力”中共力量,任用不少中共党员在其“政工队”和省、县各级政府机构中任职。但1941年宁绍战役爆发后,中共在浦东的武装力量南下浙东,建立了“三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由此开始,在浙江的国共关系便逐步恶化,国民党开始对中共组织的发展加以严格限制,以致于1942年发生了“温州事件”,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被捕牺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省委组织再次被取缔,国共关系全面逆转。

由上可见,所谓区域抗战史研究的宏观视野,绝不是区域抗战史研究中简单套用全国抗战史从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再到战略反攻的“三阶段论”,也不是简单套用基于“三阶段论”的叙事模式。因为“三阶段论”的宏观叙事就中国抗日战争的全局来看是有道理的,但如果具体到某一特定区域就未必成立。这就需要在开展区域抗战史研究的过程中,一定要从当地的具体情况入手,无论是对抗战阶段的划分还是对具体史事的评价都要基于特定区域的实际情况。

二、区域抗战史研究应当有作战全局的视野

在区域抗战史研究中,对于敌我双方作战过程的研究当然是一个重点。当我们在探讨1937年全面抗战初期平津和河北地区正面战场的作战时,很容易发现在地面作战过程中,国民政府军的地面部队未能得到空军的援助,从而极大增加了地面作战的困难,这的确也是国民政府军在华北迅速败北的重要原因,但如果我们据此就得出结论说国民政府空军对平津和河北的战事不重视或者说不愿参战,这就很容易陷入就局部论局部的误区,若对国民政府空军力量在全国的配置加以具体分析,把平津和河北地区置于国民政府对日防空的整体布局中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上述结论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到全面抗战爆发之际,国民政府的空军力量主要部署于江、浙、赣、皖的南昌、广德、句容、蚌埠、杭州、南京等地,具体分布是:在江西南昌部署第一大队、第八大队、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在安徽广德部署第二大队;在江苏句容部署第三大队;在南京部署第六大队;在安徽蚌埠部署第九大队;在杭州部署中央航空学校暂编大队,而在华北地区根本就没有任何部署。^① 国民政府在华北地区没有空军力量的配置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国民政府空军力量本来就非常薄弱,到全面抗战爆发之际,空军全部飞机也仅300架左右,其中能够参战的飞机只有223架。^② 而同期的日

① 高晓星、时平:《民国空军的航迹》,海潮出版社1992年版,第249—252页。

② 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国防部史政局1946年编印,第14页。

本陆海军航空队可使用的第一线飞机数为2300架,预备飞机约280架,军用飞行人员约15000名。^①面对如此绝对失衡的力量对比,国民政府有限的空军力量也只能作有重点的配置,难以在国土范围全面部署;第二,战前国民政府的实际统治范围基本上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在华北地区的地方势力与国民政府中央之间的关系一向比较紧张,且又长期受制于日本方面的压力,战前很难构建起对日空防体系。正是由于上述两方面原因才导致了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空军未能到平津一带助战的现实。蒋介石在1937年8月1日的一次会议上也非常直白地道出了其中的无奈:

……黄河以北,不仅地方政府平时毫无防空设备,就是中央要去训练空军,按地设防,也感受许许多多的困难,譬如敌人的破坏,使我们要准备也无从下手,就是一个证明。我们在黄河以北既无坚固适用的飞机场,中央空军要想北上作战,也不是万全必胜之策,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的飞机只有六小时的油量,即从徐州郑州加油起飞到平津一带,亦有四小时的航程,来往已赶不及,如何还能作战?^②

可见对于区域战史的研究确有必要“跳出”区域,从作战全局的视野加以全面审视,这样的研究结论方才经得起推敲。

三、区域抗战史应当兼顾“侵略”与“抵抗”两个面相

抗日战争本来就有侵略与反侵略的两个面相,但在区域抗战史研究中,由于受研究资料的限制,很多情况下主要是讲我方的“抗”,而缺少对敌方“侵”的研究,这就少了一个研究的面相。以上海地区的抗战为例,如果我们对日方在战前密集的作战部署不加以仔细的考察,就很容易陷入对谁先挑起战事的简单争论,但如果有了对日方部署的详细跟踪,我们就会发现关于在上海谁先挑起战端的问题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

以航空作战为例,实际上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日本陆军的航空队就陆续到达华北,开启了对华航空作战,海军航空队也有部分力量到华北担任援护,也就是说在上海战事爆发之前,日军早已挑起了对华航空作战的战端。那么上海地区的情形如何呢?早在1937年7月11日,日本海军军令部就下令立即编成海军特设航空部队——第一联合航空队和第二联合航空队,并将其驻地逐步由国内基地向靠近中国沿海的基地逼进。而同时由陆海两军达成的《陆海军关于华北作战的航空协定》更是明确了陆军航空队主战华北,海军航空队配合华北、主攻华中(包括现在的华东一带——笔者注)华南的作战部署。根据该协定,海军航空队在7月底到8月初逐步从国内基地移往台北和济州岛,以便随时参加在上海及附近地区的作战。^③同一时期,由“龙骧”号、“凤翔”号航空母舰编组的第一航空战队和由“加贺”号航母编组的第二航空战队也都被编入第三舰队司令长官谷川清指挥,并于8月12日到13日间侵入舟山群岛北端的马鞍群岛。^④值得注意的是,位于舟山群岛东北的马鞍群岛本来极具战略价值,早在明朝时该地就是倭寇进入大陆的一个跳板,因此抗战爆发前还有学者提出在此设防的建议,但由于对此地的行政管辖上江、浙两省一直不甚明确,这

① 何应钦:《何上将抗战时期军事报告》,《民国丛书》第2编32,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95页。

②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600—601页。

③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稿 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11页。

④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稿 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第211—212页。

就极大地便利于日本的军事部署。^①

除上述航空力量的部署外,8月7日,长谷川清还下令第十二航空队迅速搭乘军舰“神威”号以及第二十八驱逐队的战舰进入上海方面,侦察杭州笕桥、翁家埠、乔司、诸暨等机场以及上海虹桥机场、吴淞炮台。8月11日,“神威”号上的飞机从舟山群岛南端的韭山群岛起飞对上述目标进行了侦察。^②日军的这些行为已经完全构成了对中方的侵略,只是在当时还没有遭到中方的还击,而日方的计谋是中方一旦还击,便借机全面消灭国民政府空军。8月12日,日本海军在《大海令第12号》中指示“敌如来攻,应不失时机地击破敌航空兵力”。^③正是鉴于日军咄咄逼人的态势,8月13日下午,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发布《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要求各部队于14日黄昏以前秘密到达准备出击的位置,完成一切攻击的准备。长谷川清也于当日晚向其指挥下的航空部队下达了攻击杭州、广德、苏州、虹桥等地的命令。^④

8月14日上午,国民政府空军主动出击,袭击了日本海军在上海的特别陆战队本部以及日军在吴淞海面的第八战队,此外也袭击了日本的旗舰“出云”舰。^⑤当日午后,日本海军除动用在上海的航空兵力外,待机台北的鹿屋海军航空队亦出动9架飞机进袭广德,9架飞机空袭杭州。^⑥如果仅仅就上海地区的航空作战而言,无疑先发起攻击的是国民政府空军,但透过对日军作战部署的分析,我们发现问题的关键是,其实日本的陆军航空队早在7月间已经在华北有大规模的航空作战了,而且海军航空队也早已参加了在华北的作战,双方已经处于交战的状态,只是国民政府空军无力应对华北战事而已,这样,国民政府空军在上海地区的主动出击就根本不能成为日军扩大侵略的理由。

战争是敌我双方的一个互动过程,在区域抗战史的研究中,若敌方在我们的叙事中处于缺失的状态,就很容易形成单方面抗击的叙事逻辑,也容易产生评判的误区。

四、区域抗战史应当有国际的视野

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争过程中,中国既得到过盟国的援助,同时也与盟国有着各种形式的合作,这些合作有些是战略性的,有些是战术性的,有的是显性的,也有的是隐性的,而在区域抗战史的研究中很容易忽略这些方面,因此,区域抗战史必须有国际的视野。

以1942年的浙赣战役为例,从一般的区域抗战史的角度而言,它是抗战中期发生于浙江和江西的重大战役,国民政府虽然动用了众多兵力组织了抵抗,但最后仍然以失败告终。如果我们对浙赣战役的叙事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那显然就没有看到这场战役的实际影响,如果我们能够从国际的视野来看,就发现这场战役其实对整个太平洋战争的战局也是有重要影响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美军虽想实施对日本本土的空袭,但鉴于距离遥远以及技术方面的原因尚难实现,于是,利用中国境内的基地实施这一战略就成为重要选项。当时美国军方策划的空袭计划是,先将航空母舰开到距日本海岸较近海域,然后从航空母舰上出动飞机轰炸东京等大城市,轰炸完成后飞机降落中国浙江和江西境内机场。1942年4月18日,美军“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载着16架B-25型轰炸机

① 忍盒:《马鞍群岛调查记》,《水产》1936年第3卷第3—4期,第29页。

②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稿 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第212页。

③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稿 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第214页。

④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稿 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第215页。

⑤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稿 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第214—215页。

⑥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稿 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第215页。

开到距离日本较近的海域,在杜利特尔(Doolittle)中校指挥下,飞机从航母起飞后到达日本上空,对东京、名古屋以及神户等大城市进行轰炸。空袭破坏了这些城市的一些建筑,并致百余人伤亡。空袭结束后,美机按预定计划返回中国浙江省的衢州机场,但由于气象和技术等多方面的原因,80多名机组人员在返回途中被迫弃机跳伞或迫降,其中绝大多数在浙江、安徽和江西等地着陆后被中国军民救助。^①这次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极大增强了美国人民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信心,但中国却不得不承受来自日本的报复性攻击。4月22日,日本大本营改变了原有的作战计划,下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要其“击溃浙江省方面之敌,摧毁主要的航空根据地,以粉碎敌人利用该方面轰炸我本土的企图”。^②5月中旬,日军发起浙赣战役。这场战役一直持续到同年8月,由于国民政府对日军发起该战役的战略意图并不十分清楚,仓促组织抵抗,被迫应战达三个月之久,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日军在作战过程中还公然违犯国际法规,在多地施放毒气和投放细菌,浙赣境内遭受了空前的战争损失。由于这场战役完全是由美军对日作战的战略引起,而日军作战的意图也正是为了打破美军利用浙赣境内机场实施对日本本土的袭击,因此浙赣地区的军民实际上是替美军承受了来自日军的报复性进攻,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方面从作战的角度虽然失败了,但它实际上是以失败的代价换来了美军暂时放弃轰炸日本本土的战略选项,对整个太平洋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样,我们也可以从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大格局中来看新四军于1944年在浙江大规模布局的问题。抗战时期中共非常重视国际力量对战争的影响,毛泽东在1938年谈未来中国的战略反攻时就认为“收复失地,主要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地生长的力量。然而单只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还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否则是不能胜利的”。^③正因为重视国际力量对于中国抗战的重要作用,中共在各地武装力量的布局就会有国际因素的考量。

1944年7月,经过中共长期的争取,美国方面派出了军事观察组到延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美军观察组的成员进行了多方面的接触与交流,并判断美军将来肯定会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实施对日登陆作战。毛泽东关于美军将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的判断及时地通过中共的内部系统传达到了新四军。8月21日,毛泽东在致张云逸和饶漱石的电文中讲道:“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和我军配合作战?”“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已不在很远。因此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④9月27日,中共中央向华中局发出《关于发展苏浙皖边地区的总方针和部署》,明确提出“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的条件,对苏浙皖地区的工作应有新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⑤11月2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又致电张云逸与饶漱石,指出“美军可能在杭州湾登陆,而我们在那一带工作还很薄弱”。^⑥根据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1944年8月以后,中共大力扩展在浙江地区的军事力量,准备配合将来盟军在东南沿海一带的登陆作战。最早是新四军第十六旅发起了在浙江的长兴战役,基本上控制了太湖西南岸地区,同年12月中旬,新四军第一师根据中共中央

① 王国林:《轰炸东京——中国救助美国飞行员纪实》,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页。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贾玉芹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稿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0页。

③ 《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00—701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7—538页。

⑤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浙西抗日根据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 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页。

和华中局的战略部署,兵分两路从苏中南下浙西地区。到次年5月,建立起了浙西抗日根据地。可见1944年新四军之所以在浙江作了大规模的部署,其主要的战略出发点就是准备配合盟军在东南沿海的登陆作战,当然,后来的情况是美军最终放弃了登陆作战计划,新四军也离开了浙江。新四军从大规模进入浙江到最后撤离,也反映出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与中国战场的联动关系。

总之,透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开展区域抗战史研究的过程中,如果能以宏观的视野审视史事,就可以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使区域抗战史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对微观实证研究的否定,恰恰相反,具有宏观视野的微观实证研究才是区域抗战史研究的正道,空泛的宏观叙事和没有宏观视野的琐碎探究都容易陷入研究的误区。

[作者袁成毅,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马晓娟)

如何突破“学术第一岛链”

韩东育

中国的对外交流,固然需要穿越地理和军事意义上的“第一岛链”,但我以为,“学术第一岛链”的突破,在当下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尤显迫切。可当我们尝试着这样做时却发现,除少数学者和学术团队外,历史学界更多和更切实的感受,往往是力不从心。这或许该怪我们自己:长期以来养成的自说自话陋习和假大空式理论壮志,已经把历史学最可宝贵的细节追究传统,抛掷到了脑后,以至一条细微的材料,便可以让无数个理论体系“忽喇喇似大厦倾”,多米诺效应竟少有悬念。重要的是,我们遇到的学术对手总喜欢细节的追究,而由小见大和论从史出的方法又每每要胜出以大化小和史从论出的学风等事实,意味着对真确和细节的重视与重提,已不再是你想与不想的问题,而是必须如此的问题。由此,恕我直言,在抗日战争问题上日本学界一直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学术“岛链”,似乎从很早以前就在苛酷地拷问着中国学界:那种动辄把政治家和军人推向“前线”的做法,其实已暗示了学者的失职。

在抗战中,蒙受过巨大灾难的中国,理应在战争性质和被害细节上最具发言权。为此,我们曾不止一次地批判日本学者,声讨他们拿“近代”遮掩“暴力”、用“被害”置换“加害”和以“定量”否定“定性”的惯常恶习^①,也不止一次地想认真破解上述恶习之延伸线上的“竹内好之问”^②和“沟口雄三之问”^③,但如实讲,在确凿证据的掌握和诡辩逻辑的解构上,中方学者似乎还有着巨大的提升空间。与司法领域的好人饮恨案例相仿佛,人们明知道眼前这个侃侃而谈的被告就是杀人犯,唯因证据不足,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无罪释放。战争期间,日本军所制造的罪恶应远比我们所掌握的资料还要多,但当下讨论历史问题的各方人士,又恰恰均非中日战争的“在场者”。这意味着,资料

① 参见韩东育《战后七十年日本历史认识问题解析》,《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② 参见竹内好「近代の超克」,《近代化と伝統》,筑摩书房,1959年。

③ 参见沟口雄三等《创造日中间知识的共同空间》,《读书》2001年第5期。